

# 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启示

江 沛

〈南开大学〉

## 摘 要

构建现代中国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对于现代中国学的学科建立、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共通性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创造性的提法，也是基于几十年来国际汉学的成就积累、中国国内当代各个领域研究快速进展的前提下提出的，是现代中国学研究理论化、学科化需求的必然反映。

什么是现代中国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是一个首先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我个人认为，一个学科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的日臻完善，关键在于其所属各个子学科的理论体系的相对成熟、研究成果的相对丰富，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升华出这一学科研究的内在规律，逐步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与方法，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认识。因此，本人从中国近代史学科近年来在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的变革展开讨论，或许可以对现代中国学的理论体系构建有所帮助。

## 一、“革命史学”范式与中国近代史体系的建立及缺失

19-20世纪之交，在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下，中华帝国已呈四分五裂之势。“救亡图存”成为知识群体及上层政治群体最为关切的话题。由此，达尔文“进化论”等西方思潮的影响及“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刺激着民族主义思潮及激进主义思潮渐成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在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影响下，中国史学开始走出乾嘉学派的影响，力求从民族主义视角解释近代中国历史的演变，确定了1840年后中国近代历史上“侵略——反抗”的中西文明对立形态，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建立起了对西方列强道德谴责的形态，也形成了西方列强是造就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罪魁祸首的解释体系。这一史学解释体系，奠定了近代中国倍受侵略、民族屈辱的反抗正义性，却没有解决如何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前进的根本问题，特别是没有阐述清楚世界体系与中国的互动关系。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

产党》一文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确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历史演变中的主导地位，创造了中国近代历史存在着“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两个过程”理论。1947年，范文澜在延安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完全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模式写作，其指导思想即是中共七大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著作尝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把世界体系影响下的复杂多变、内容丰富的中国近代史，浓缩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创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学”范式，也是此后至今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形成的源头。1950年代，胡乔木、胡华、胡绳在相关著作中，延续并具体细化了这一解释体系，推动了史学家思考中国近代历史角度的转变。1951年起，史学界展开的对中国近代史分期标准的广泛讨论，为“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胡绳第一次提出了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观点。他的“两条基本线索”、“三次革命高潮”的假说，将中国近代历史解释成为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对立与斗争的历史，是革命主导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方向。这一学说在当时曾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热烈讨论。除在具体事件划分上有分歧外，绝大多数史学家接受了“两个基本线索”的假说并自觉应用于研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著作和讨论适应了意识形态的需要，不仅继承了对近代历史的民族主义视角及其解释体系，而且重新建立起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完成反帝反封建双重任务为根本的近代历史形态，创造出了一套全新的解释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史学”范式，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的主流由此确定。

1980年代后，这一学说又被发展成为李时岳的“四个阶梯”论和张海鹏的“七次高潮”学说，陈旭麓还提出了“一条主线、两个过程”说。章开沅则把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作是一种民族运动，并试图从这一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史的线索问题，但他也指出：并没有以另一条线索代替“两个过程”说的意图，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中国近代历史全过程的主干。

按照上述思维的逻辑，在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阶段划分问题上，中国近代史学界同样确定了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中国开始近代历史的标志性界限，意在强调此后中国近代历史是一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且为了强调中共与新文化的关系及苏联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对应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中国近代史又被分为了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阶段，以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与现代历史的分界点，目的正在于强调中国革命分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部分。

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中，这种“革命史学”范式的影响至深且远，至今历然。尽管“革

命史学”范式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受到了不少批评，但持此观点者坚称：它“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和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

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激烈形态，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是参与者最多、空间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物质破坏最严重、客观影响最剧烈的政治运动，也是19—20世纪前半期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但革命毕竟不是近代历史的全部，它只是政治史的重要构成之一，无法取代近代中国各个领域丰富多彩的历史演进，将中国近代史的演变等同于“革命”或视为其影响的结果，不仅具有片面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可能性，也容易产生非此即彼的排它性认识，更有可能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革命也是各方面利益严重冲突、难以协商的结果。那么中国革命的由来，显然是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结果，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维护民族权益与抗拒西方侵略的表现。革命运动是一种体制外运作形态，具有暴力特征，对其的合理性解释必须放在历史空间中进行，不能预设一个绝对合理的前提，此外，革命运动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进程中的产物，在思想体系、行为模式上必须具有新旧杂陈的特征，只有客观的评价，才是真正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无视革命运动的两面性，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近代史的规律及其趋势。

1950年后大陆“革命史学”范式的形成，在特定背景下与意识形态相结合，从而导致了近代史学的政治化，使得中国近代历史的解释体系以革命为中心展开，所有历史现象必须置于革命的立场上考察，从而使得不少历史事件及人物性质的判断缺少客观性，甚至为了建立革命立场而形成了一系列所谓研究“禁区”。此外，以“革命史学”范式解释近代历史演变，不仅需要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理解乡村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城市中的劳资雇用关系，由点及面的扩大矛盾程度并想像出“阶级对立”而非利益对立的形态，进而建立起革命正义性与必要性的观念，而且无形中夸大了革命的作用，

把革命视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动力。于是，历史与社会的变革异化为了革命的变革，在以革命运动为重点的阐述中，历史与社会的演变渐渐被解释革命的需要所肢解。这种“革命史学”范式最终甚至极端化为“革命崇拜”，从而使中国近代历史的解释体系，带有明显的缺失，一部中国近代史渐变成了中国革命史，许多事件及人物的评价难以自圆其说。这一模式甚至对国外学者的研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成为影响科学的中国近代历史体系构建的重要因素。

## 二、“革命史学”范式外中国近代史学体系的重构及问题

1990年代前，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学术积累不足及史学传统等原因，大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上的创建近乎荒芜。在“革命史学”范式外寻求新解释体系的努力，基本上是由国外学者完成的。在国外高校及研究机构中，对中国的研究多属于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的范畴，中国的近代历史自然也是世界近代历史的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历史自然被置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考察，其与中国大陆“革命史学”范式所产生的历史描述及认识差异极大。

从1940年起，美国的中国学从古典文献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转向对中国近代史、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的中国学因此称作“中国学”(Chinese Studies)，而非欧洲所称的“汉学”(Sinology)，具有极强的时效性、政策性和目的性。被誉为“中国学之父”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人引导了这一转变。他以“冲击——反应”模式讨论中国的近代历史的基本特征，相当关注中国与世界近代历史变革进程的关系，开创了新的思考角度，影响了至少两代美国的中国学学者。在“东方主义”理论兴起后，这一理论体系被质疑为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把中国的近代变革视为西方历史演进的附属物，较少关注中国自身的经验与因素。

1960年代后期，以列文森(J. R. Levenson)、芮玛丽(Mary Wright)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兴起，认为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后停滞不前，但社会与文化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从中国的“传统社会”向西方的“近代社会”演变。1990年代后，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在将上述研究模式质疑为“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后，提出了“中国中心论”，“从中国发现历史”，试图以中国历史与文化演进的规律去解释中国的近代历史。美国学者王国彬、彭慕兰等人的著作，更是开始把中国的近代变革放在世界体系中加以解释与比较。在当代中国的研究模式上，美国的中国学经历了1949年后的“极权主义模式”，强调中国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研究，忽略了社会各方面的变动；1960年代后，强调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及分层的研究兴起，构成了“多元主义模式”；1990年后，以前美国学者又把考察东欧国家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拿来考察中国。

日本对中国学的研究贡献极大。1950年代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受冷战局势的制约，反对与支持中国的观点相当对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学者逐渐有条件对中国展开实证性研究。真正称得上学术研究的时期是1980年后，日本学者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全方位地展开对中国的研究，学术的整体水平较高。近年来，不少学者转向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及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比较，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少数民族、西藏、台湾等问题的研究也受到重视，日本中国学的一线学者还不断推出新作，特别强调从亚洲的角度考察中国变革及对日本的关系，是令人关注的新动向。

在当代日本学界，中国问题的学科归属基本划在东亚区域的研究范畴。这一设置，不仅将中国置于东亚的国际关系中考察，而且赋予了中国研究以开阔的视野，对中国的研究基本没有按领域进行条块分割，而是采用综合的研究手法，共同探讨、互相启发。爱知大学 ICCS 中心先后两次举办有关现代中国学理论与方法的国际会议，同样采用了学科交叉的研究模式，令人印象深刻。

1980年代后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呈现出极大活力，一得益于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管理的松动，二得益于欧美及日本学界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三得益于近二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各个领域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于是逐渐而有创立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之呼吁。

回顾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演变可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外部势力入侵、中国文化衰败的刺激下，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巨变。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寻求现代化运动的开端，“师夷长技”以至“变法图强”，包括太平天国的“大同理想”，目的都是寻求中国的“富强”之路，但核心价值观是儒学体系下的“中体西用”，此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环境的束缚，这一意识仍未得到政治高层及下层民众的足够认同；民国初年，当帝制结束、共和体制开始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民主”、“科学”大旗的高举，诸种西方思潮的涌入，意味着现代化运动在观念层面上开始得到知识群体的广泛认同，核心价值观开始从“打倒孔家店”进而向“西化”转移，但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并无明确的方向，所以才会有“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口号，唯独没有“民主救国”的意识；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既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必然，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一个曲折阶段的开始，学习西方的方向发生逆转，“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批判西方成为新的价值观，此时的现代化目标很明确：“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运动的展开，明确提出了吸收一切人类先进文明（以西方文明为主）的口号，此时现代化运动的意识及目标极其清楚，核心价值观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建设小康社会”演变到今天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21世纪中叶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强国。这样一条清楚的历史发展脉络，才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流。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群体一直在争论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担心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泛滥会导致中

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丧失，其实这种争论内蕴的民族主义情结相当浓重。冯友兰先生曾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不可逆转的过程有一个精彩评论：“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sup>1)</sup>。

1980年代，罗荣渠教授开始倡导以“现代化理论”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新模式，可以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提下、受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及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等诸种启示而产生的，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特征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学术理念上的重大转变和巨大进步。罗荣渠教授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应该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新的研究要求在概念、模式、理论、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但这些突破又只有通过系统的、切实的研究才可以取得”<sup>2)</sup>。以现代化的范式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正是基于世界及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根本动力所在及发展特征的。进入21世纪，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一体化进程愈加明显，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其实就是在这一世界体系演变影响下的结果。因此，世界体系中的中国，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眼光。

有人会认为，以现代化范式解释世界及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会不会是对“革命史学”范式的彻底否定，我个人认为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而只有认识论上的差异。恩格斯曾说过：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工业革命，具有“比其它任何国家发生的变革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实践上，它一定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更快地达到目的。英国发生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的任何领域，那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有所影响，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

响下发生某些变化”<sup>3)</sup>。社会革命的概念应该包括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经济革命等内涵在内。如果一定要坚持“革命史学”范式的话,那么这个“革命史学”范式就应该是“社会革命史学”范式。如此,才有把握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特征进而接近历史真相的可能。

当然,在矫枉过正的心理影响下,“革命史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一些学者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以否定中国革命为根本出发点,凡是与革命有关的事与人一概加以否定,这也不是历史研究所应该具有的客观态度。

在以现代化模式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时,同样存在着一个模式与真实的矛盾,是必须要考虑的重大问题。近代中国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的进程,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社会结构的不少方面,可能会有变化极快的领域,如政治体制、工业化、城市化、交通技术等,也有不少领域并没有明显变化,如农村经济、民俗、民众价值的观念等。中国文化传统的意义,也是建立现代化模式时所必须要强调的因素。既然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就必须强调本国传统的稳定性与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变与不变并存、新与旧杂陈的社会进化现象,应该如何现代化模式里体现?如果不加以认真考虑的话,现代化模式同样会屏蔽掉许多重要的历史本相,也同样会在想像中“再造”历史,这种历史的研究也同样会远离历史的真实。如何处理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是能否准确考察中国的近代历史的关键所在。

### 三、几点启示

1992年,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以往的民族历史,是在相对封闭、且各自独立的境地中产生的,工业革命后,西方近代化的文明正在向世界各个角落推进,人类的未来有可能会走入普遍史的路途,历史将会真正地成为单一形态。历史终结论也认为,现代性应该终结,应该抛

开那些对历史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摧毁那些旧有的单一的思维及行为模式,承认世界及事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特别要指出的是,其实中国学者雷海宗、林同济等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即对未来世界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态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不管这一理论预设是否正确,今天世界的全球化与一体化趋势,却是众所周知且无可更改的。

从这一角度上看,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及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实际上是封闭的传统帝国——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化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的近代历史不应被人为割裂,应把1840年后中国的近代历史直至今天,看作是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完整过程,这一过程尚未完成并处于不断地展开中,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其实只是历史问题的延续;许多不合理之处,其实也是旧有体制的弊端所致,因此,长时段地考察近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必须的视角与思路,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特征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换言之,研究现代中国学,必须具备历史的眼光。

中国近代历史范式的转换过程及特征,对探讨现代中国学理论与方法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一、要把中国置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考察,关注它的变动与世界间的重大关联;二、要从中国现实出发,不要割裂18世纪以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整体进程;三、要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特点及功能,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是一个必然趋势,但中国的现代化并不一定是西方型的现代化形态,由于自身文化的底蕴,中国的现代化必然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四、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及宣传的影响,强调学术的客观分析;五、要特别注意中国社会存在着的新旧杂陈互动、变与不变并存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标准式的框架体系,都难以整齐划一地将现代中国客观、完整地表述出来;六、要吸收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考察复杂的中国社会变迁,创建综合的考察现代中国的理论与方法;七、现代中国学的理论框架应该是开放的,富有弹性的,

方法应该是多样的。

目前，在国际化的现代中国学日益深入发展的同时，对现代中国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全可以进行，但真正形成成熟的理论与方法，还要在系统、切实的研究基础上逐步得出。对于中国史学家而言，当务之急在于突破旧有的“革命史学”框架，进行更为系统、切实的研究。至少，具有较为客观本相、以追求事实本源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历史学，可以为

现代中国学理论与方法的创建有所启示。

#### 注释

- 1)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
-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00页。
- 3)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6页。